

周建波等 著

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与管理XianQinZhuziYuGuanLi 先秦诸子与管理XianQinZhuziYuGuan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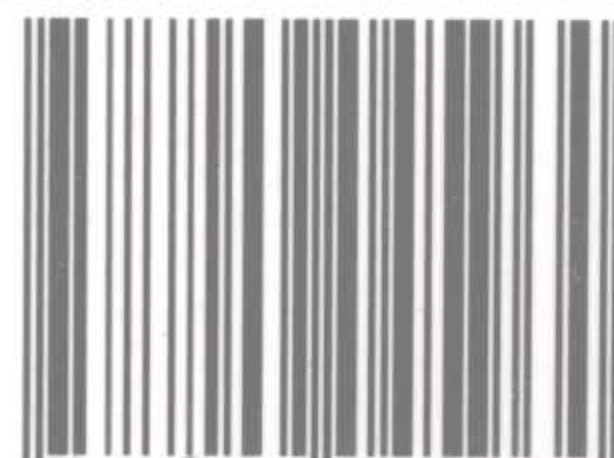
与管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明功

封面设计 张丽娜

ISBN 978-7-209-04596-4



9 787209 045964 >

定价: 30.00 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先秦諸子與管理 / 周建波等 著. —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209-04290-4

I. ①先... II. 周... III. 管理哲學—哲學思想—研究—中國—先秦時代 IV. C93-05 13530.2

中國版本圖書編目(CIP)數據(2008)第133093號

先秦諸子與管理

周建波等 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诸子与管理/周建波等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209-04596-4

I. 先... II. 周... III. 管理哲学-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C93-02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063 号

先秦诸子与管理

周建波等著

责任编辑:李明功
封面设计:张丽娜

先秦诸子与管理

周建波等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 开 (170mm×240mm)

印张 20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596-4

定价 3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633)8221365

前言



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不同学派间的思想之争，而就其本质来看则是围绕未来社会如何构造的制度之争。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春秋战国是非常重要的—段时间，它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文化定型的时期。从经济上讲，这是公有经济向私人经济转变，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向个体家庭生产方式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从政治上讲，这是国家由间接管理天下的分封制向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制转变，中央政府由松散的联邦体制向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变的时期。从文化上讲，这是德礼思潮兴起，既讲“德治”又讲“礼治”，既讲强化政府权威又讲对政府权威加以制约的百家争鸣的时期。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不足以凝聚人心，而新的、能将全社会的意志凝聚到一起的新价值观还没有产生，因而社会充满了混乱，用孔夫子的话讲，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在这种“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每个阶级的思想家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这些方案中，固然有统一的地方，但差异甚至对立的地方也不少。由于每个学派都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往往“以己所是攻彼之所非”，于是“百家争鸣”出现。

诸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异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站在社会管理者的后备军——“士”的立场上，既看到了人有认识未来的能力，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即具备仁义的潜质之处，也看到了由于人的视野、能力的局限性，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之处，因而既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人群之间的矛盾，又不主张政府的权威过分强大，要求对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督。综观儒家大师孔、孟、荀的言论，约束政府权

威的手段主要有：民间的舆论监督，官员的辞职、进谏，王室成员对昏庸无道君王的废黜，以及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民众革命等。

为了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儒家大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坚持岗位职责，方法是文武之道，但以教化为主。目的之一是提高民众预见未来、自我约束的能力，少犯或不犯错误；目的之二是提高民众成功地化解社会冲突的能力，这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政府力量的依赖，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目的之三是从民间选拔更高素质的人做官员，这有利于提高整个官员队伍的素质，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站在小私有者（包括个体小农、个体工商业者等）的立场上，既看到了小农经济劳动欲望高、工作干劲强的优点，也看到了小农经济规模小，受不了天灾人祸打击，社会成员之间容易相互侵犯的弱点，主张依靠更大规模的组织——政府来保护小生产者的发展。但考虑到造成小生产者破产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政府的贪欲，这不但造成了民间经济的萎缩乃至破产，还引发了列国间的战争，给小生产者以更大的打击，因而墨家以节用论为中心，对政府提出了远比儒家高得多的要求——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

墨家对政府提出了如此严格的要求，如何能让社会成员，尤其是统治者遵守墨家规定的岗位职责要求呢？万一统治者不愿意做或做不到怎么办？墨家借用民间广泛存在的宗教信仰力量，提出“天志”、“明鬼”主张，主张以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天，也就是老天爷的力量来约束统治者。

应该说，墨家的理想很高远，但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老天爷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约束力量，对崇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中国人来说，是起不到太大的约束作用的。基于此，只能顺应人们对富贵（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的追求，尤其是对长远富贵的追求——即不仅能得到富贵，还能长久地保持富贵，来约束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的高官厚禄主张是正确的，它顺应了人们对富贵的追求，提高了统治者的犯错误成本，使他们有动力坚守岗位职责。此外，儒家重视教育的主张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提高人们预见未来、算大账的能力，从而自觉地遵守岗位职责。还有，儒家重视对官员监督的主张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提高官员犯错误的成本，使他们更自觉地坚守岗位职责。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站在社会大变革中失去原有利益的没落阶级（“隐士”）的立场上，在感叹自己不幸命运的同时，也反思自己没落的原因。他们认为，统治阶级的贪婪只是强化了他们虐害百姓的动机，而统治者迷信手中的权力，不惧怕百姓的反抗，才是他们虐害百姓的动机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道家还认为,统治者贪婪的欲望所以能够被刺激起来,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产品的层出不穷有密切关系的。为此,道家一是主张统治者寡欲。只有寡欲,才能减少对统治者的贪求,才能造成社会的安定。二是要求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懂得守弱、善下、包容、谦和的重要性,不要过分迷信手中的权力。须知,“民不畏死,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三是要求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少私寡欲”,“绝圣弃智”,这样才能避免新产品的层出不穷对统治者贪欲的刺激,才能实现天下的太平。

道家的创始人本身就是统治者阶级中的一员,这使他们对统治者的贪婪、虚伪、过分迷信手中的权力,以及利用制度的漏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套太熟悉了。由于对统治者不信任,自然导致对统治者管理社会的工具——文化、制度不信任。如何让社会实现长久的太平呢?道家提出无为理论,要求人们顺应自然,循道行事,而不要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恣意妄为。将这一理论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就是主张小政府,要求政府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让百姓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安排生产和生活。

应该说,道家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作为一个由理性人组成的法人团体,政府也有在既定条件的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当约束不足或约束不到位时,政府确实倾向于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无数史实所证明。从这一角度上讲,道家倾向于对其手中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是有道理的。但是,道家的不足在于:

第一,道家的做法矫枉过正。毕竟民间有办不成、办不了的事情,这就需要政府来解决,为此必须给政府以必要的力量。道家为了限制政府滥用权力,把它的手脚也一并捆上,这就犯了马克思所讲的“把洗脸水连同脸盆里的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它固然有助于遏制政府犯错误的倾向,但也无法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西汉王朝初期的“无为”政策所以会被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代替,原因就在于政府力量严重不足,无法完成社会赋予的维护社会安定、保护疆土安全的职责。

第二,道家的做法不具有可操作性。须知,人的天性都是追求利益的。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人更看重眼前利益,因此,道家希望统治者“少私寡欲”的想法,在一段时间可以行得通,但要使统治者长期过着寡欲、简朴的生活,无疑这是违背人的天性、难以做到的。另外,这也不利于鼓励更有才能的人来从事管理的工作。因此,尽管《老子》的反思非常深刻,但矫枉过正,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长期贯彻。

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站在统治者、执政者的立场上,又身处兵荒



马乱、社会严重失序的时代，自然特别强调强化政府权力的重要性，而对如何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犯错误等思考不多，这造成了他们思想的偏颇，也带来了实践的巨大灾难。秦始皇依靠法家统一了江山，但仅仅十五年就丢了江山，原因就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走向腐败。

法家诞生于战国时期。其时，列国争霸，社会兵荒马乱。显然，建立一种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强大社会力量，由它来协调彼此的争端，解决社会的冲突，是最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的，法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要统一天下，就要进行战争。为了保证战争的长期进行，就不能不指望经济的发达，为此就要强调农业的作用，法家的耕战政策由此而来。为了扩大并保护自己的阶级基础——小农，法家主张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开展，这样势必要严重影响旧贵族的利益，并引起他们的反抗，法家不惜以武力的方式坚决镇压之。鉴于小农家庭致富的多渠道性，为了将小农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法家提出“利出一空”主张，要求将小农致富的其他渠道统统堵死，而只让他们按着耕战的渠道得到并积累财富，这样就不能不严厉打击商人、游侠、书生等依靠别的渠道致富的社会阶层。商鞅把不事耕战的社会阶层称为“五虱”，韩非子则把他们称为“五蠹”，都要求坚决打击之。总之，法家是靠着对外、对内的强制方式来实现天下一统的，其好处是干脆利落，便于短时间内实现目标，其不足是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一旦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的限度，政权的崩溃即在眼前，秦王朝的覆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法家主张以武力的方式快速恢复秩序有其合理之处。但秩序一旦恢复，法家政策的副作用就开始暴露。第一，依靠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国家长期保持强大的力量基础上的，一旦国家的力量衰弱，这一政策便不可能实行得下去；第二，一旦和平年代到来，人们不需要把相当部分的人身所有权交给国家就能够得到安全，自然要求收回已经交付给国家的这部分权利。秦王朝灭亡后，强调国家尽可能少干预社会生活的道家所以能够为社会普遍接受，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反映。三是一旦和平到来，人们的需求便发生变化，由追求眼前利益向追求长远利益，由追求物质生活向追求精神生活转变，这意味着着重看眼前利益、追求物质生活满足的法家不能满足民众需要，肯定要为民众所抛弃。

为什么历史最终接受了儒家而不是别的学派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呢？这主要是由儒家崇尚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原则——中庸之道决定的。所谓“中”，就是无过无不及的意思，指矛盾诸方都感到满意的、稳定的均衡状态。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合适的政策、合同、制度等。鉴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的无

限性之间的矛盾,要实现“中”这一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目标追求,就要对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状况有详尽的、精确的了解,这就对“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知己知彼并不能保证百战不殆,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提出大家普遍满意的方案,这样才能实现“中”,做到百战不殆。而要提高认识世界的动力,就必须承认自己力量不足,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样才有动力研究他人,做到知己知彼。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都有偏颇之处。假若说道家强调柔,法家强调刚的话,那么儒家便主张刚柔相济;假若说道家强调文,法家强调武的话,那么儒家便强调文武之道;假若道家强调不争(以不争作为争的手段),法家强调争的话,那么儒家便强调争和不争的结合;假若说道家强调为己,墨家强调兼爱的话,那么儒家便强调爱己和爱他人的统一。总之,由于儒家坚持“中”的价值观,强调既适应传统,又要顺应现代;既立足自身,又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因而能够超越时空,有普遍的应用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原因。

根据中庸之道原则,儒家强调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结合。所谓正式规则,就是以国家法令出现的政策、制度;所谓非正式规则,就是民间的传统习俗。儒家既强调正式规则对非正式规则的指导作用,又主张正式规则要尽可能顺应非正式规则,即国家法律应尽可能适应社会习俗的变化。与儒家强调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结合相反,法家太强调国家法律对非正式规则的指导作用,主张非正式规则要适应正式规则。道家太强调非正式规则的作用,忽视正式规则对非正式规则的指导作用。墨家主张“尚同”,对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矛盾冲突甚少考虑。

至于百家争鸣中的其他派别,如阴阳家、名家、杂家、兵家等,都从不同方面开拓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视野,对百家争鸣走向深入很有促进作用。以阴阳家而言,这一学派顺应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对严重影响小农经济发展的自然气候、地理地貌等做了深入研究,要求人类按大自然的规律办事,反对凭主观意志的恣意妄为。这一学派还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发展历史做了研究,提出五德终始论。从强调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道受到天道影响的角度来说,阴阳家的理论确实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理,这是它的优点。其弱点之一在于过分强调了大自然运动规律的普遍性,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弱点之二在于过分强调大自然运动规律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而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发挥重视不够,有使人匍匐在大自然脚下之嫌疑。另外,五德终始论过于强调事物变化的一面,而对事物稳定性的一面重视不够,



这也是它的一个严重不足。正因为此,司马谈认为阴阳家“使人拘而多所畏”,刘向、刘歆父子也认为阴阳家容易使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名家顺应社会大变革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事物间的关系需要理顺的要求,重点研究如何为事物命名以及“名”的内涵与外延等。其优点是有助于拓宽人的视野,对我们树立辩证思维观念,以及正确地进行逻辑推理很有作用。其弱点是为研究而研究,有流于诡辩之嫌疑。例如,惠施之流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统一性而对其对立性、差异性重视不够;公孙龙之流则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对立性而对其统一性重视不够。

杂家产生在天下即将一统的战国末期。在经过了长时期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后,人们逐渐了解了诸子学说的长短,这就为杂家的综合百家奠定了基础。杂家的不足在于以黄老之学作为综合百家的指导思想。黄老之学崇尚寡欲的特性,使得杂家不能顺应统治者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而其提出的主张也不能被统治者长期地遵守。另外,它还容易造成税收征发的不足,使统治者无力解决国内外遇到的一系列争夺资源的矛盾。这意味着杂家的综合百家只是为以后进一步的综合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还不能被社会接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兵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从宏观上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致力于战争制胜之道这一专门领域的研究。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各地区政治、经济联系加强,争夺资源的冲突增多,要求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协调矛盾的产物。当和平的途径不能达成这一目标时,自然要通过战争的途径来解决。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永恒的矛盾,社会总是充满着治乱之间的不断的循环。在一个兵荒马乱、恶性竞争充斥的社会,要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离开武力是做不到的,而要取得武力的胜利,就一定得研究战争制胜的规律,就必须确立竞争优势,这就是兵家永恒的价值。

诸子学说产生的顺序

上述所谈仅仅论及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及其差异,还没有从时间角度理顺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最先出现的是管仲的学说。管仲是春秋前期人,作为齐桓公的丞相,管仲顺应生产力发展,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向小家庭生产方式转变的趋势,在经济领域进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改革,承认私人土地的合法性,并把国有土地包给农民耕种,国家只从农民的收入中收取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在社会领域,按照士农工商的新社会分工进行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改革,重新进行社会编制。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尊贤育才,以彰有德”的改革,对传统的

旧体制——分封制、世卿世禄制造成严重冲击。在国际关系上以“尊王攘夷”相号召,重新整合华夏世界。葵丘之会的盟约第五条规定:“无曲防,无遏籴”。这是说,各国不准设堤防截断邻国的水源或使水流向邻国泛滥,以邻国为壑;各国不准禁止粮食出口。显然,这是生产力发展、各地区联合增强,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协调生产关系的反映。

管仲的改革具有新旧并存,以新代旧的特点,也就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不断加入新内容,以便逐步地取代旧制度,这是管仲时期小农生产方式蒸蒸日上,但还无法取代集体劳作生产方式,无法给其致命一击的反映,也是管仲的和缓式改革有别于商鞅的激进式改革的重要原因。换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约束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表现方式的不同。

由一个社会内部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所滋生出来的社会大变革总是具有长期性、缓慢性的特征,只能在旧生产关系的框架内不断加入新内容,而新旧制度的不断冲突是无法使社会秩序长久地稳定下来的。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强,民众在无法建立稳定预期的情况下,只能看眼前利益,这就使得社会成员争夺资源的矛盾冲突不仅非常频繁,而且更加非理性,这是一个旧的社会秩序瓦解、新的社会秩序远远没有建立的严重“失序”时期。在这样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无道时期,如何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重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呢?首先,孔子强调制度建设——“礼”的重要性,提出了“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其次,孔子看到了“礼”背后的文化因素——“仁义”的作用,要求以“仁义”精神来规定“礼”的具体内容,并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断对“礼”进行“损益”,做到与时俱进。再次,孔子要求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众多的矛盾关系,诸如传统与现代、长远与眼前以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矛盾。根据孔子的中庸之道理论,在解决社会矛盾时,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刻舟求剑,顽固不化。当发展新生产力的时机不成熟时,不妨更多地对旧生产关系妥协;随着新生产力的不断成长,就要加大变革旧生产关系的力度。一旦全面变革旧生产关系的时机成熟,就要当机立断,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的改革。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它是孔子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结果,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普遍原则。

进入战国以后,小农生产方式更加发展,已经具备了取代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的绝对实力,这意味着对旧生产方式给予致命一击,进行全面变革时机的成熟,这就是席卷各国的战国变法运动,以商鞅变法最具代表性。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成功,封建制生产方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

域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思想派别,无论是儒墨道法,还是阴阳、名家、杂家、兵家等,其共同点都是:主张建立并推动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按照才能、品德来选拔官员;要求统治者树立公心,以天下为己任,避免感情用事;要求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需要说明的是,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并不是不要国家,而是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民间事务)。其差别仅在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各阶级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等。由于各学派代表的阶级不同,导致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儒家、法家代表封建制生产方式的上层——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最重视社会秩序的建设,要求社会成员能够遵守岗位职责,希望以此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但在如何让人遵守岗位职责的途径上,儒法主张有所不同。儒家相信“人性善”,对人充满信心,主张通过教化,让人看到长远利益,从而自觉地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遵守岗位职责。法家相信“人性恶”,强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和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要求以强力逼迫人们遵守岗位职责。儒法两派所以产生这个差别,原因有二:一是儒家成员更多地来自新兴地主阶级的学者,职业的特点使他们能够脱离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有时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使得他们的眼光开阔,倾向于通过教化来改造人。法家成员则更多地来自新兴地主阶级的官员,职业的特点使他们容易陷入琐碎的事务性工作,更关注当前社会秩序的稳定,倾向于强调看眼前利益的制度的作用。二是儒家成员更多地在黄河下游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活动,这里战争爆发的次数不多,民众更追求民主生活、精神生活,这使得儒家重视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问题;法家成员更多地在黄河中上游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活动,这里战争频繁,民众更追求物质生活、眼前利益的满足,这使得法家更重视通过强制的途径解决问题。

墨、道两派代表封建制生产方式的下层——小生产者和各种竞争中的失败者的利益。这一阶级的资产规模小,更容易经受不住外界天灾人祸的打击,因此特别强调统治者职能的发挥,要求他们爱民、有公心、寡欲、不循私情等。所不同的是,墨家代表小私有者的利益,尽管他们的家庭资产规模不大,但对未来还充满信心,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道家代表的是各种竞争中的失败者的利益,他们的家庭资产规模更小,更经受不住天灾人祸的打击,因而愤世嫉俗的倾向很强,很容易成为现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例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多拿道家作为反抗统治者的思想武器。墨家、道家的弱点在于:一是提出了对统治者的很高的要求,但严重忽视了统治者对利益的追求,这

是违背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的,因而不可能为统治者长久地接受;二是对统治者寡欲的过分强调,造成了国家税收征发的不足,使得统治者缺乏必需的力量来完成安定内部秩序、保卫疆土安全的重任。

至于阴阳家、名家、杂家、兵家等,则主要围绕着社会变革的某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深化了百家争鸣的主题,将百家争鸣推向前进。阴阳家主要从自然对社会的影响这一角度探讨人类应该如何生产、生活,对人类如何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有促进作用。名家围绕着不同事物关系的协调这一问题,从“名”的确定及其内涵、外延的角度进行探讨,有利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兵家针对生产力发展引起各地区经济联系增多、矛盾冲突增多的现象,对战争制胜的规律进行了探讨。杂家产生得最晚,主要从综合百家的角度进行探讨,尽管综合得并不很成功,但为今后更进一步的综合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被全社会普遍接纳的思想一定要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容纳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并在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按照有差别的等级原则进行分配。显然,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具备这方面的素质。第一,儒家强调用“仁义”精神来规定“礼”,要求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地对“礼”进行“损益”,既肯定“礼”的稳定性,又重视“礼”的变化性,这对以“礼”治天下的政府管理很有促进作用。第二,儒家提出用中庸之道来协调不同阶级争夺资源的矛盾。它承认全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对财富追求的合理性,反对寡欲,显然这是对道家的批评。它强调有差别的、等级的爱,反对无差别的、泛平等的博爱,显然这是对墨家的批评。它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反对一味地使用强制手段,显然这是对法家的批评。正因为儒家既有原则,又有很大的可包容性,因而最终被选择为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一是如何看待春秋之前,也就是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有很大的争论。一派意见认为,这是奴隶社会;还有一派意见认为,这是封建领主制社会。但不管如何争论,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承认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单独的小家庭无法独立耕作。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集体劳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经济更发达的地方是某些生产阶段实行集体劳动,其他时间全归家庭经营;经济更落后的地方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集体劳动。我是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是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因为,假若是奴隶在生产劳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话,必须有发达的奴隶市场,且奴隶价格便宜,这是建立在有源源不断的奴隶供应基础上的,显然只有不间断的战争才能做到这一点(债务奴隶的数量不大),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然而，西周时期的战争并不经常发生，且获取的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并不是生产劳动的主体。正由于奴隶的生产价值不高，才发生统治者大量使用奴隶陪葬的事情。假若奴隶是生产劳动的主体，生产价值很高的话，奴隶主杀害他们不是大大伤害了自己的利益了吗？

另外，集体劳作并不等于就是奴隶劳动。照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集体劳动，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生产的产品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只得到其中满足基本生活消费的部分。西周时期集体劳作生产方式的分配制度显然不是这样，它规定只有公田所获归统治者所有，这是统治者承担社会管理职能所得到的收入，至于私田所获则全归生产者所有，显然这是农村公社自由民的分配方式。因此，我是倾向于西周社会是封建领主制生产方式这种说法的，所谓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就是以封建地主制生产方式取代封建领主制生产方式的。由于前者是个体家庭生产，后者是大家族生产方式，因此这一社会大变革也可以称之为个体家庭生产方式对集体劳作生产方式的替代，我更习惯于用后者来表示这一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性质。

二是为什么把《管子》的管理思想放在第一章。原因就在于《管子》虽不是管仲亲写，而是管仲的后学为发扬管仲思想和功业而就各种问题所写的论文。但生活于春秋前期的管仲，顺应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向小家庭生产方式转变的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仅帮助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而且拉开了春秋战国变革的序幕，并指明了未来变革的方向，此后的诸子百家就是在管仲改革的基础上，根据时代提出的任务的不同，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沿着不同的方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本书在框架的构建上存在的失误主要是没有写纵横家。纵横家可谓中国古代的外交家，他们纵横捭阖，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与国的力量，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它和法家、兵家一样，是与兵荒马乱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对管理者如何搞好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如何更艺术地讲话，快速达成协议很有帮助。只是由于时间、精力关系，本书还没有涉猎到这一内容，这一遗憾只能留待再版时弥补了。

此外，本书在谈老子、韩非的管理思想时分别用了两章的内容，与全书的框架显得很协调，这主要是课堂上给研究生分配任务时，写作老子、韩非的学生分别有两位，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写作，后来在编辑时，感到丢掉哪一部分都可惜，于是就全保留下来了，特作说明。

本书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围绕着人和资源的冲突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探讨先秦诸子是如何思考建立长治

久安社会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无疑,这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由以下内容构成:

前言

第一章 《管子》的管理思想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

第三章 孟子的管理思想

第四章 荀子的管理思想

第五章 《中庸》、《大学》的管理思想

第六章 墨子的管理思想

第七章 《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

第八章 《老子》的管理思想

第九章 《庄子》的管理思想

第十章 商鞅的管理思想

第十一章 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

第十二章 韩非子的经济管理思想

第十三章 《吕氏春秋》的管理思想

第十四章 名家学派与 modern 管理

第十五章 阴阳五行学派与 modern 管理

第十六章 兵家学派与 modern 管理——以《孙子兵法》为中心

周建波

2008 年 8 月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管子》的管理思想
32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
57	第三章 孟子“王政”思想解析——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体系建构及现代启示
78	第四章 荀子的管理思想
102	第五章 《中庸》、《大学》的管理思想
110	第六章 《墨子》的管理思想
124	第七章 《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
136	第八章 《老子》的管理思想
154	第九章 庄子的管理思想
172	第十章 商鞅的管理思想
197	第十一章 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214	第十二章 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
233	第十三章 《吕氏春秋》的管理思想
248	第十四章 名家学派与现代社会管理
271	第十五章 阴阳五行学派与现代社会管理
285	第十六章 兵家学派与现代社会管理——以《孙子兵法》为中心
301	后 记

第一章

《管子》的管理思想

【内容摘要】《管子》是战国时期崇信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之名而编成的一本著述总集。这部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与春秋早期管仲治齐的思想与功业有联系,是管仲后学为发扬管仲思想和功业而就各种问题所写的论文。管仲的功业是“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政治经济思想是“作内政而寓军令”,“设轻重鱼盐之利”。其中心思想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管仲后学不外从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阐述和发扬管仲的中心思想。本章首先介绍《管子》一书及其主要思想,接着分两部分介绍管仲的社会编制思想、废分封的政治改革思想,再接着介绍《管子》的利欲论、重农思想、工商思想、财政思想等,最后谈对当今管理的启发。

【关键词】“四民分业”、“作内政而寄军令”、“均地分利”、“侈靡”

一、《管子》一书及其主要思想

管仲(约公元前 730 年~前 645 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改革与建树。管仲年轻时家里很穷,曾作过小商人。后来成为齐国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公子纠不胜身死。公子小白立为齐君,就是齐桓公。桓公用管仲为相^①,在齐国推行封建制改革。由于封建制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齐国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强大的诸侯国,齐桓公也成为当时诸侯国的霸主。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里对管子高度赞扬:“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① 《史记·管晏列传》。